

现当代文学研究

理论与实践的裂隙：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困境与成因

魏雪慧

摘要：历经十余年的发展，中国非虚构写作在创作者与研究者的合力下，取得了可观的本土化实绩，但疲态渐显。在理论方面，“无边的非虚构”令边界模糊，减损了文体的锐度，“后真相时代”亦增添其写作难度。在实践方面，写作者身份与思维的相近、对写作对象症结问题的悬置、对“怎么写”的忽视，导致非虚构作品趋于同质。究其本质，乃是“非虚构”理论与实践间的裂隙过大。写作者对真实性原则的偏离、非虚构文本表现内容与表达方式的碎片化、非虚构文体对文学功能性的过分强调，共同造成非虚构写作与初衷渐行渐远。

关键词：非虚构写作；后真相时代；同质化；文学性

在写作者与研究者的合力推动下，乘着中国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东风，非虚构写作自 2010 年以来，已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不容忽视的一股潮流，不仅在研究领域引发争议与热议，也突破文学圈层，获得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与认可。但近年来，非虚构写作的“降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与“非虚构”概念的理论困境及实践性偏差密切相关。

一、理论困境：“无边的非虚构”与“后真相时代”的写作难题

“非虚构”作为舶来品，在中国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学界长期对关键理论问题——何为“非虚构”边界缺乏共识。概念的持续开放，

使非虚构文体的边界与核心定义愈发模糊，呈现出一种向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全面开放的倾向，“似乎‘非虚构’变成一个定语，后面联缀的‘写作’显示出巨大包容力，可以对接文学、新闻特稿、田野调查、社会学报告、历史普及读物”^①。这导致其社会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经典的非虚构文本较为匮乏，且创作后继乏力。当非虚构写作的社会意义，以及作为舶来品的“陌生化”剩余价值被耗尽时，这一概念将陷入陈旧与失效的危机。因而，有学者预言其未来：“如果我们观察报告文学的历史，大概可以想见非虚构的未来——非虚构概念在被不断地征用，

^① 金理：《近十年非虚构写作的收获与经验》，《文艺报》2022 年 10 月 12 日。

耗尽它的可能性之后迅速地在文学史当中被收编,重新放置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上。”^①

目前,写作者、读者、学界三者间众口难调,暂时无法对“非虚构”概念形成共识,以致大众认知和各大平台图书榜单中的“非虚构”文本,与学术研究中的非虚构写作相去甚远,这从近年版本各异的“非虚构排行榜”可管窥一二。

表 1:2023 年以网络平台为依托的“非虚构”书籍榜单

	2023 年当当网非虚构畅销榜	阅文·探照灯书评人好书榜 2023 年度十大非虚构原创好书	QQ 阅读 2023 年度非虚构书单
1	《你也走了很远的路吧》	《转折:1947 年中共中央在陕北》	《我在北京送快递》
2	《被讨厌的勇气》	《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	《相信》
3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真与美:丘成桐的数学观》	《医生,你在想什么》
4	《病隙碎笔》	《汪曾祺的 1000 事》	《灰女(增订本)》
5	《钝感力》	《我在北京送快递》	《把日子过明白》
6	《我从未如此眷恋人间》	《野性骑行:穿越非洲六千里荒漠》	《克拉克森的农场:田园生活从开始到放弃》
7	《苏东坡传》	《梨与枣》	《成为雍正:从隐忍的胤禛到帝国权力巅峰》
8	《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	《故乡那么辽阔,为何还要远行》	《我想和你谈谈精神病人的世界》
9	《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	《上海城记》	《十三种闻树的方式》
10	《正面管教》	《等待的母亲》	《金钱心理学:财富、人性和幸福的永恒真相》

表 2:2023 年以文学报刊为依托的“非虚构”榜单

	2023 年“收获文学榜”长篇非虚构榜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 年度文学排行榜散文(含非虚构)榜	《作家文摘》2023 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1	《太阳透过玻璃》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九个瞬间》	《世界是这样知道毛泽东的》
2	《独留明月照江南》	《独留明月照江南》	《溪山清远:中国古代早期绘画史(先秦至宋)》
3	《西高地行记》	《从城南到城北》	《续命:奥斯维辛女子乐队纪事》
4	《云梦泽吟》	“万物生”专栏(阿来)	《我在北京送快递》
5	《盐镇》	《忆德公》	《也曾隔窗窥新月》
6		《故人三题》	《奔跑的中国草》

表 2:2023 年以文学报刊为依托的“非虚构”榜单(续表)

	2023 年“收获文学榜”长篇非虚构榜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 年度文学排行榜散文(含非虚构)榜	《作家文摘》2023 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
7		《横断浪途》	《芯片战争:中国最关键技术争夺战》
8		“履霜志”专栏(黄德海)	《还有谁谁谁》
9		《入神记(五章)》	《奥本海默传:美国“原子弹之父”的胜利与悲剧》
10		《人们叫我机师傅》	《顾涌芬:把理想写在祖国蓝天》
11			《基辛格谈基辛格:关于外交、大战略和领导力的省思》

如表 1、表 2 所示,在 2023 年互联网平台的非虚构榜单中,心理学、散文随笔类、社科普及类图书占据席位,文学报刊的排行榜则尚未达成共识。《扬子江文学评论》未单列“非虚构”榜单,而是将其归至“散文榜”;纯文学刊物《收获》更聚焦长篇,注重历史向度的、富有公共性的文本;作为兼顾时政的综合性文化类报纸,《作家文摘》由网络投票与终评小组投票产生最终结果,更具科普性、通俗性。

造成当前“非虚构”榜单五花八门的原因之一,是非虚构写作“跨学科与媒介”的特性。在中国非虚构写作的所指尚不明朗之时,它与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人文社科的亲密关系,令其边界更加暧昧不明,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时髦称谓,导致核心不明且结构臃肿。自 2010 年《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专栏以来,该刊已相继刊发边地风物、人生手记、现实体察、器物文化、史事钩沉等多种类型的作品,各文本间的内容、行文差别很大,难以用传统文类条分缕析地分门别类,放在“非虚构”这个灵活实用的“博古架”上恰好合适。但言必称“非虚构”,实则是文学的“懒政”,体现出相关理论的乏力滞后。

“非虚构”的名号遮蔽了不少有待详加区别的细化概念。然而,界定非虚构写作的边界注定困难重重。一方面,这一尝试需要解决海量且

① 陈曦:《非虚构,抵达真实的中国现场》,现代快报+ZAKER 南京, <http://app.myzaker.com/news/article.php?pk=5f9d3c231bc8e0f7720000ec>, 2020 年 11 月 1 日。

缠绕的历史存量文本。另一方面,2010年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尚缺乏足以撑起门面的经典作家作品。如学者杨庆祥所言,“迫切需要建构‘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形象学”^①,用能够称得上“招牌”的作家作品,明晰这一文类的形象,及时正本清源。然而,学界在肯定非虚构写作重建与现实生活联系的同时,尚存在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在现实与现代针锋相对的比较中,将“非虚构”视为强化文学与现实关联的“万能胶”,似乎一旦作品打上“非虚构”标签,便“自带流量”且逻辑自洽。此外,凭借新媒体力量不遗余力的推广,非虚构写作已然成为大众文化形态的一种,亦归为商业操作的对象,不同利益团体各执一词,在可预见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其边界与内核将很难达成共识。

除内部困境外,外部媒介大环境的变化,也增加了非虚构写作的困难。当人类步入互联网时代,资讯的爆炸加剧了信息的混乱程度。现代人渴求真相,却饱受虚假“真相”摆布,“后真相”(Post-truth)一词应运而生。它源于英文世界,《牛津词典》将其解释为“客观事实的陈述,往往不及诉诸情感和煽动信仰更容易影响民意”。在“后真相时代”中,信息保鲜度较低,短时间内便能掀起一场接一场的“观点狂欢”、一次又一次的剧情反转,公众情绪被煽动又滑向失落,独立思考的能力被扑朔迷离的真相损害。在此时代背景下,非虚构写作以反抗虚假、强调真实的形象出现,将姿态摆得很高。但在真相稀缺、态度泛滥、假新闻频出的“后真相时代”,真相变为复数,每个人对真相都持有个人化的解读方式,或者拥有不同版本的真相,这无疑给非虚构写作带来一系列问题。

首先,全面铺展的社交媒体使公众能够随时随地获取、传播、交流信息,物理世界的距离被信息高速路填补。在遵守公序良俗的前提下,直播平台与社交媒体给予普通人直接成为叙事主体的机会,从而绕开传统媒介“代为发声”的低效渠道,技术赋权令真相可以即时获取、便捷传达、交互沟通。但这些新的发声媒介,在满足传统新闻的基本特点之一——迅速之余,却无法贯彻另一要素——真实。新媒介追求即时性,甚至“零时差”,而非虚构写作则是一件耗工夫

和心神的“传统手艺活”。与自媒体相比,它从采写到编发,速度与效率均处于绝对劣势。当某一事件突发,公众舆论场鱼龙混杂,一些受众已遭受铺天盖地的自媒体信息轰炸,产生先入为主的态度与情绪。非虚构写文本提供的“真相”,无论信息量还是时效,都无法满足受众。当深入挖掘事件来龙去脉的非虚构文本出现时,新闻“热度”往往已经消退,关注量将大打折扣。碎片化、图像化、浅显化,是后真相时代自媒体信息的显著特征,直接的感官刺激,极大改变着受众接受信息的偏好。每篇平均万字左右的新闻类非虚构文本,对“读屏”一代而言,阅读量过大,以至于一些平台会特别标注“本文××字,阅读××分钟”,更遑论以书籍形式出现的文学类非虚构图书,这亦是“读屏”的时代病之一。

第二个困境是,非虚构写作者如何取舍浩如烟海的事件信息与现实素材。受限于家庭背景、教育情况、个人经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盲区与短板,存在立场与倾向。在“大数据”的算法加持下,个人视野将愈发窄化,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个人偏好引导,被包裹于感兴趣的信息舒适区。在飞速运转的现实面前,作者如何走出“信息茧房”,最大限度地为读者展现事实的多面性,这是后真相时代的棘手难题。

“闯入者”模式是非虚构写作的基本范式,主要分为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讲述—倾听—记录”和“体验—记录”。前者由事件当事人讲述自己的经历、身边的故事和个人的看法,而作者倾听,用录音或笔记整理成文。后者是作家深入某个特定地区或者特殊人群中,但又因不适宜用访谈形式做调查研究,只得通过实地观察和感受,占有素材,然后记录下来,整理成篇。^②这两种表现形式看似能够如实记录、还原真相,但落实起来却又十分困难。

“讲述—倾听—记录”形式,主要依靠写作者与事件当事人的沟通,有时讲述者所述的

① 杨庆祥:《“非虚构写作”的历史、当下与可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② 王磊光:《论“非虚构”写作的发生机制》,《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4期。

未必是真相。“每个人都有意图,沟通者自然会选择有助于推进个人意图的真相。不过,这种选择可能符合道德,也可能具有欺骗性。沟通者可以传达与客观现实相符的印象,也可以传达故意歪曲现实的印象。他们的意图可能是善意的,也可能是恶意的。”^①因此,非虚构写作者需要具备丰富的生活经验、社会经验,能够快速分辨讲述者口中的真相,小心考证存疑处。

而“体验—记录”形式,恰恰容易招致第三个困境。“非虚构”作为一种写作方式,虽然倚重直接材料,如生活现场、已发生的事件、历史材料等,但本质仍是对事实的重构。写作主体叙述时,不免牵入主观视角,令真相主观化。于是,非虚构写作具有“敞开”(呈现)与“遮蔽”(误导)的二重性,即在呈现真实时,无法避免带有主观理解的一家之言。在“体验—记录”式的非虚构写作中,写作者的“介入”与“在场”恰恰增加了叙述的主观性。从写作者的视角来记录体验的场景,来感受体验的生活,来抒发体验过程中的情感。且不说短暂的“体验”过程能否真正深入真实的生活现场,更遭诟病的是,它作为一种“猎奇探险”,带着体验者“找不同”的心态,导致部分写作者最终难以摆脱先入的前理解。

浸泡在互联网信息海洋中的现代人,适应了事件多重反转的呈现方式,习惯于隐匿在屏幕背后,宣泄非理性的情绪。在由大众传播机器构成的“拟态环境”中,真相已经发生偏移,“任何人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事件,只能有一种凭他对那事件的想象所引发的感情”^②。然而,后真相时代的理性者则选择“让真相飞一会儿”。我们应当承认认知偏差的存在,承认写作者与读者均身处真相迷雾,在承认“先天不足”的基础上,广采博纳地观察与思考,争取从信息茧房中“破茧而出”。非虚构写作是一个新文类,目的是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强关联,因此理应承担起这方面责任,在充分尊重客观事实、认真进行事实核查的基础上,更加充分地理解问题,努力展现多元立体的真相。

二、实践困境:同质化的非虚构写作模式

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工业视为现代社会生

产和消费体系的一部分,它遵循商品交换规律,具有批量生产的物化特征,其产品具有标准化、程式化特点。在新媒介的生态中,非虚构写作日益成为被商业化操作的对象,一旦某些文本获得不错的销量或口碑,相似题材的作品便迅速批量出现。这种模仿—复制—大规模生产的模式,无法真正提升非虚构写作的质量,无法帮助其走得更宽、更远。相反,这种虚假繁荣的规模效应,加剧了同质化问题,收窄了非虚构写作的面向。造成同质化写作困境的原因,主要可归为四类。

首先是追求故事化、事件化的功利写作。其中既有创作者自身的原因,也有读者的原因,两者彼此影响。从接受端看,当代读者“避重就轻”的阅读偏好明显。相较于沉重、宏大、悲剧性的话题,读者更喜好轻快、日常、娱乐化的话题。阅读,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的公众号阅读,是读者在碎片化时间中的消遣方式。从创作端看,平台或创作者为获取流量与传播,或追逐热点,甚至刻意制造热点引流,或以敏锐的商业嗅觉,模仿、复制和批量生产已经成功的写作范式。如此一来,写作者削平了创作深度,题材选择愈发狭窄,具有表面化、消费化、类型化特点,行文时又带着公式化的思维。并且,随着发布作品的门槛降低,非虚构写作呈现鱼龙混杂的状态,一些创作者成为“内容流水线工人”,消隐了创作的主体性。基于微信公众号平台的新媒体写作平台,受众已逐渐稳定,它们以流量为导向,形成一套固定“打法”,专门炮制“爆款”文章。这些“短、平、快”的文本,大多缺乏内容积累和深度挖掘,文学性的沉淀也有待加强,只适合“读屏”的碎片化阅读,与达到出版门槛的纸质书籍仍有差距。

此外,我们还需要警惕一个正在发生的趋势,即关注个人戏剧化遭遇,表达个人内心世界的“小叙事”文本增多,社会性的、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文本减少。文体的惰性在此显现,它们着意突出影视化的强情节,难以穿透事件表象,抓住症结与本质问题的能力较弱,面临被体制化

① [英]赫克托·麦克唐纳:《后真相时代》,刘清山译,第15页,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② [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林珊译,第8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的危险。^①当这些文本所记录的时代时过境迁,其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还剩几何?其实,故事化与事件化的内容,并不是创作的原罪。如若处理得当,故事与事件也能够勾连出严肃的议题,问题的症结在“功利”与否。例如美国作家卡波特的代表作《冷血》,它的题材颇具暴力、犯罪的猎奇性,作家只需如实记录故事,就能快速处理成一则吸引眼球的血腥通俗故事。但是,卡波特突破了对犯罪题材的单纯记叙。他花费五年时间,大量走访、访谈,甚至与狱中的罪犯建立友谊,深入暴力产生的根源。通过这桩现实中发生的恶性案件,他深挖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的犯罪问题,并将批判矛头指向教育问题,《冷血》因此获得了超越时代、超越文学的思想价值与社会意义。

其次是写作者将症结悬置,回避或放弃深究问题本质。一方面,创作主体的“问题意识”不足,多延续陈陈相因的老话题,将常见的话题板结在一起,如返乡、犯罪、打工等。^②同时,这些文本的个人性小境遇偏多,公共性的大问题正在变少。个人经验的泛滥,导致非虚构缺乏进入公共性重大议题的勇气和能力。聚焦个体命运的同时,总体性的历史感和整体观被忽略,非虚构写作成为碎片化的“景观”展示。写作者叙事时,着力讲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却回避或放弃追问事件表象背后的结构性症结,造成缺乏“整体性”的问题。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存在难以跨越的现实难题。诗歌语言的“编码—解码”过程,造成其多义多解的特征,小说的虚构性则是其“庇护所”,从这个意义而言,非虚构写作似乎“无处遁逃”,注定无法触碰问题的核心。作家在写作前一般会对所写内容自我审查,写成后再由编辑、出版社等层层审核批准。这是一个时间长、流程多的繁杂过程,经过筛选的主题都较为安全。与之相比,非虚构写作的新媒体平台所受的限制更即时。在内容安全性与流量需求的双重压力下,非虚构平台的选题方向受到诸多限制,在“他禁”与“自溺”的双重审查下,无法触碰一些真正需要深入挖掘的核心话题,因此,在禁区与危险话题的边缘游走,吃力不讨好。趋向“中产阶级趣味”的轻松话题,则是安全妥当的双赢选择。受书写内容刚性边

界强化的影响,新闻与文学领域的非虚构写作不约而同将目光下移,以“小叙事”书写日常生活,深层次的社会结构问题被当作故事的大背景,由此规避深入挖掘的危险性。不可否认,写作者们受限於社会讨论空间的缩小,主题的同质化亦带着不得已的无奈。

第三,非虚构写作者身份同质化,写作思维相近。虽然文学素人为非虚构写作注入新鲜血液,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垄断,呈现平民化、全民化倾向,但总体而言,不论是文学还是新闻领域的知名非虚构写作者,绝大部分仍是中文系或新闻系科班出身的“学院派”,基本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其中不乏名校毕业生。他们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趋于同质化,工作、生活的圈子较为狭小,在自己所属的社会“同温层”活动。所以,若这些写作者只是在体验生活时,短暂地、间歇地进入被写者的生活现场,势必不彻底、有隔阂,甚至带有偏见。当代生活的异质性愈演愈烈,各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大,不同群体间的认知沟壑加深。如果写作者不能有效地进入当代生活,这些异质性自然无法及时抵达非虚构写作者,许多值得书写的话题被天然“屏蔽”在其视野之外。

同时,写作者自身的知识背景转化为写作思维,影响着文本走向,这一点在知识分子“返乡书写”题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写作者梁鸿、黄灯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王磊光是文化研究专业的博士,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显露出各自知识体系的痕迹。写作者对此自知,并在创作谈中剖析这种难以剥离的“前视野”。梁鸿既是写作者,也是文学研究者,她对这种思维的固化十分警觉:“在我们重返故乡或思考村庄之

① 杨庆祥曾在访谈中提及此问题:“‘体制化’是指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判断、我们的审美,服从一个单一的模式。比方说,我们的‘非虚构写作’只能描写底层、描写农民工,这就是一种可怕的体制化。”参见沈闪:《碰撞与呈现:新世纪中国“非虚构写作”研究》,第151页,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

② 2013年,书写打工者的非虚构文本、社会学调查接连出现,有人将它们合称为“打工六书”,包括吕途《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梁鸿《出梁庄记》、张彤禾《打工女孩》、丁燕《工厂女孩》、潘毅《中国女工》、魏城《中国农民工调查》。

时,我们的前视野非常重要,它必然影响并形成我们所观事物的感觉和判断。它常常表现为一种‘道德想象’,即用自己文化、生活的理解,用自己的认知框架去建构一个‘乡村’。”^①多年后,当她回看《中国在梁庄》,觉察出了知识分子式自我抒发的弊端:“《中国在梁庄》有过于鲜明和抒发的味道,这限定了文本意义的扩张和敞开。在写作《出梁庄记》时,我最终选择以一种克制、谨慎、相对冷静又含带情感的语言方式和叙事方式进入‘梁庄’。”^②她也从曾经的行文,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中乡土文学,尤其是鲁迅的影响:“我总是不自觉地在模拟一种情感并模仿鲁迅的叙事方式,似乎只有在这样一种叙事中,我才能够自然地去面对村庄”^③。

除文学专业科班出身的作家外,不少普通写作者也习惯使用社会学武器,从社会政治经济视角写作。作者带着心中已有的答案去找问题,在社会田野中找材料,从而构成另一种“非虚构中的虚构”。此外,目前的非虚构写作还显露出一些思维定式,如城乡二元对立思维、合理化犯罪行为、习惯性剖析原生家庭等。

第四,非虚构写作者注重“写什么”,相对忽视“怎么写”。20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作家祖慰就曾指出:“我们的报告文学叙述方式比起小说来,太单一了。我也是如此。大部分作品是第三人称全知观点叙述。作者像电台广播员一样,向读者讲述一个人物或事件。作者对报告对象(‘他’)无所不知。这种叙述方式对作者来说是最方便的,但对读者来说已熟而生厌了,而且旁观叙述总是缺乏真切感。现在已有少数报告文学用第一人称叙述,让被报告对象自己来讲。这就增加了叙述的真切感,还可对叙述者的心理作细腻的刻划。但是,有利就有弊。第一人称叙述法使作者失去了发言的权利。写小说忌讳作者议论,但报告文学,好象读者希望作者夹叙夹议,欣赏一些精当之论。这样,我认为可以根据内容,寻找多种叙述方式。”^④叙述方式单一这个报告文学的瓶颈,依然制约着当下的非虚构写作。

非虚构写作强调真实,注重对所写对象做如实记录。但目前其抵达“真实”的途径相对固定,文本结构、叙事方式较为简单,导致审美价值的缺乏。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在评论现实主义

问题时指出:“当一位小说家试图成为一个社会学家和宣传家的时候,他就只能生产出一些拙劣的、沉闷的艺术;他就只会去呆板地展示自己的材料……在其低层,现实主义还在退化为新闻报道、论文写作和科学说明,一句话,正在退化为非艺术;而在其最高层,由于有那些伟大的作家们,有巴尔扎克和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亨利·詹姆斯和易卜生甚至左拉,它就常常能超越其理论的限制,创造出富有想象的世界。”^⑤“写什么”与“怎么写”并不冲突,路遥的写作被评论者称为“体验式现实主义”,正是因为他极其重视在体验生活的同时,突出作家在写作中的主体性、主观能动性,熨贴地处理好材料、结构、语言等诸多要素之间的关系。

于是,如何平衡文学性与真实性,使非虚构写作不沦为现实材料的机械堆砌,是写作者需要攻克的难题。然而,目前的非虚构写作已出现某些“套路化”的写作程式。在知识消费需求的刺激下,非虚构写作训练营频频出现,它们总结出若干套普遍适用的“写作秘籍”,传授非虚构写作的方法论。以新闻领域非虚构写作的重镇、“中国式特稿”的发源地《南方周末》为例,它近年来通过开办“南周写作营”并出版《南方周末写作课》,将非虚构文类中的特稿写作拆解为捕捉选题、结构搭建、线索获取、叙事质感、细节呈现五大步骤,通过技巧层面的传授,帮助初学者快速进入非虚构写作。^⑥虽然这些方法论

①②③ 梁鸿:《中国在梁庄》(附录),第309-310、312、310页,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

④ 祖慰:《我报告了他,他报告了我》,张德明编:《报告文学创作谈》,第19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⑤ [美]勒内·韦勒克:《批判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第23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⑥ 例如,“经典开头十式”:直接引语、第一人称讲述、动作开头、专家言论、描述事件、突破常识性问题、完整故事、场景式、引人深思式、观察式;“经典结尾五式”:金句式、叹息式、首尾呼应式、提出新问题式、借鉴文学作品的结尾方式;“写好细节的四步骤”:观察、写作训练、细节准备、问;“提高故事‘高级感’的三种方法”:找到叙述的节奏感、勾勒故事的画面感、制造独特的语言风格;“让故事更有文学性的四种方法”:“抽象阶梯”、变换叙事视角、使用“自由间接引语”、避免简单地贴标签。引自南方周末编著:《南方周末写作课》,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旨在帮助初学者入门,但这些固定程式,在不少现有非虚构文本中都能寻到踪迹。常见的开头模式为:由上帝视角的细节,尤其是动作细节入手,并刻意不让主人公在第一段直接出现,第二段着重介绍故事背景,第三段使用直接引语,增强文本的现场感和真实性。

重复的叙述模式势必导致审美疲劳,目前中国非虚构写作的题材、内容和叙事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同质化倾向。如果任由艺术惰性滋长,虚假繁荣的非虚构“流水线”,势必无法生产出真正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精品。反观那些已获声名的非虚构写作者——梁鸿、黄灯、袁凌、南香红等,无论他们来自哪个领域,都找到了个性化表达方式,并坚守具有深度的选题,其文本都打上了独具个性的烙印。以《南方周末》前高级记者南香红为例,她的非虚构写作题材涉猎广泛且具有深度,善于引出事件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尤其擅长文化类的选题,如“野马的故事”“北京旧城改造”“新疆文化探寻”“三峡无法告别”等。她在这些涵盖范围甚广的选题中,花费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持续深挖,形成了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行文风格。我们应当珍视这样的写作者:在浮躁的写作氛围中,他们坚定地瞄准某些擅长领域,长期地、多角度地、多数量地持续挖掘选题,尽可能多地掌握第一手材料,并且不断加深理解,持续学习,对所写的领域拥有一定话语权,使选题常做常新。

三、困境本质:理论与实践的裂隙

关于“非虚构”的讨论持续了十余年,但学术讨论的声量有限,很难穿透学术圈层,理论层面的争论与意见对非虚构写作实践产生了多大的影响,甚至是否能够产生影响依然存疑。我们不得不承认,非虚构写作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裂隙一直存在,并持续扩大。2020年10月,在第四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举办的“中国‘非虚构’和‘非虚构’中国”讨论中,与会的作家、学者仍围绕“非虚构”“真实性”等概念打转,对其定义、边界与意义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这折射出围绕非虚构写作的理论期待与实际创作之间存在不少裂隙,有时理论独自空转。从这

些裂隙中,我们可以管窥目前某些创作困境的本质。

首先,我们发现作家创作非虚构文本时,并未完全践行真实性原则,有时甚至背离。每一位非虚构写作者对“真实”限度的理解各异,造成各自文本的主、客观比例不同。本质化的真实不存在,每一位非虚构写作者都有进入真实的个性化途径,它们建立在其对真实的理解基础上,是“有限度”的真实。但作为一个特定文类,“非虚构”亦有一些共识需要遵循,即坚持材料来源与使用的真实,反对合理想象和艺术加工,然而事与愿违。

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最早刊发于2012年《人民文学》第11期的“非虚构”栏目。但实际上,作者实地参与团队调研的时间只有五天,其余素材来源是借助录像带、团队其他成员的转述以及作者自己的艺术拼贴。作者也毫不讳言文本的虚构成分:“实际上这里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比如姜立生,杨柱,吕有万,很多很多。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在建立一个现实世界时,我其实企图将读者带到另一个我的世界,我要表达的世界。”^①孙惠芬的自述十分具有代表性,它引出一个典型的悖论:作为文学的非虚构写作,究竟能不能“将读者带到我要表达的世界”?而作为“非虚构”的写作目标,难道不是呈现“真实”的世界吗?

同时我们发现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小说”与“非虚构”作为可便捷更换的外衣,有时在不同语境与场景中被灵活变换。从2000年春季开始,杨显惠的“命运三部曲”之一《夹边沟记事》,在《上海文学》以小说的名义连载。五年间他寻访一百余位“右派分子”,颇有勇气地触碰已经幽灵化的历史事件。其后的《定西孤儿院纪事》是他三年内采访一百五十多名孤儿的成果。这个系列的作品现实主义叙事功底深厚,擅用白描手法,以真实的故事质感打动读者。但《上海文学》推出该系列时,命名为“纪实性小说”。原因之一是虽然小说中绝大部分故事都有原型,所有的细节基本真实,但一些核心情节是

^① 何晶:《孙惠芬:我想展现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文学报》2013年1月24日。

根据故事需要而虚构的。^①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小说”是一种发表策略,“非虚构”之名无法置放此类沉重的历史主题。若“命运三部曲”系列这样有扎实的实地探寻、有经得起推敲的细节、行文中主客观得当的文本,需要被归为“小说”,那么与之相比“虚构”成分更多的《生死十日谈》,则更难以纳入“非虚构”麾下。从某种角度看,《人民文学》之所以开辟“非虚构”专栏,却又无法界定与制定其规则,亦可以视为一种刊物的发展策略。

其次,当前非虚构写作的表现内容与表达方式较为碎片化,思想力不足。《人民文学》推出“非虚构”专栏的初期,曾抱以很高期望:“我们认为,非虚构作品的根本伦理应该是:努力看清事物与人心,对复杂混沌的经验作出精确的表达和命名,而这对于文学来说,已经是一个艰巨而光荣的目标。”^②可是,目前能提供思想价值的非虚构文本十分有限,这与其特点相关。其一,它强调个人化的视角与个体性的体验。这诚然是对碎片化时代的回应,却也导致缺乏整体性、超越性的视野,呈现碎片化的细节拼接特点。其二,非虚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平民化的记录方式,而不是结论性、总结性的专业写作。伴随写作的全民化,越来越多素人参与书写自身经历,但大多是“一次性”材料,表达方式与内容均有碎片化特点,缺乏深广度。

虽然新闻领域的非虚构写作被视为业内的“奢侈品”,万字左右的篇幅对新闻读者是一种“挑战”,较长的生产周期极大考验着创作者与平台的耐心与实力。但就结果而言,新闻类非虚构写作囿于篇幅与创作周期,仍存在碎片化问题,即使它在新闻界已属于“深度报道”。而在文学领域的非虚构写作中,富有思想力的长篇文本不足,一些长篇文本只是量的积累,未能达到思想上的容量,内里仍是由碎片化内容拼贴。学者丁晓原曾指出非虚构写作“题旨的轻量化”问题:“一些作品容量不足,分量不够。有的只是现象叙写,有的偏向个人生活书写,缺少更多的生活内涵和时代关联。”^③鉴于此,个人化视角不应桎梏非虚构文本的思想力。相反,当写作者做到“专、精、深”,对书写对象、题材本身具备一定的认识深度,有了向内挖掘和向上

提升的能力,两者将相辅相成。

第三,强调连接现实的功能性,文学性欠缺。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出现,被认为是文学性的扩散。文学领域曾对其寄予厚望,希望借此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强关联,将作家从封闭的书斋拉出来,撒向广袤的大地,以此获得文学的真实性和现实性。《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专栏后,同年又发起“人民大地·行动者”写作计划,“吁请海内作家和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向现场,探索田野和都市,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走向这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内部”^④。可以说,从2010年《人民文学》正式拉开文学领域的非虚构写作序幕起,它便承担起“复兴现实主义”的重担。随后几年借着新媒体的东风,新闻与文学领域的非虚构写作确实热闹不已。但是,我们愈发觉察出“写作”与“文学”之间的差距,即便文学性的缺失常被“跨文体与媒介”的属性遮盖。

既然非虚构写作属于文学范畴,那么文学性无疑是其最基本的质素。但目前的非虚构写作更强调重建文学与现实生活强关联的功能性,如全民写作、关心底层、关注时代变迁、记录生活现场等,文学性被置于相对不显眼的位置。写作者往往关注如何选题,却忽视怎样表达,写作者花费大量时间体验生活,却在写作时投入不足,当写作话语权扩散至素人后,更是很难保证文学性的稳定。对此,学者杨庆祥尖锐地指出非虚构写作“因为想象力和形式感的缺乏而形成了一种粗糙的、形而下的文学社会学倾向”^⑤。

文学性缺乏的原因之一,是创作者将“非虚构”与“虚构”截然对立。虽然非虚构写作强调现实性,但并不意味它需要全然放弃虚构写

① 参见邵燕君:《贴着地面行走——〈定西孤儿院纪事〉的特色及其新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

② 《人民文学》编者:《留言》,《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

③ 丁晓原:《非虚构文学的逻辑与伦理》,《当代文坛》2019年第5期。

④ 商华萍:《“人民大地·行动者”》,《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9日。

⑤ 杨庆祥:《“非虚构写作”的历史、当下与可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7期。

作的技巧。实际上,优秀的非虚构文本一定能与优秀的虚构文本一较高下,两者间的跨越有助于打开双方的叙述视角。譬如作家鲁敏的长篇小说《金色河流》。小说借一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家的小老板“有总”的一生,及其儿女的故事,反映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社会变迁。作家有意设计了一位关键人物——调查记者出身的谢老师,他从报道“有总”负面新闻的“良心记者”,摇身一变成为“有总”身边的公关总监。他随身携带的红皮笔记本原是为记录并揭发“有总”的“罪恶”,但在长期相处中,他与上司悄然变为知己。笔记本的内容也随之变化,从“天然地”批判揭露资本原罪,转为客观地看待财富的获得与人性人心。记者谢老师与红皮笔记本的设置,正是作者对“非虚构”的刻意戏仿,它在展现人物心路历程、开启小说多重视角、推进叙事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金色河流》的亮点之一。

如学者何平所言:“在非虚构写作被增容和泛化的当下,有必要重新回到2010年《人民文学》倡导‘非虚构写作’时的问题意识和精神

原点,强调非虚构文学对报告文学,乃至散文的文体矫正力量;强调非虚构文学所承载的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洞悉和思考内容;强调非虚构写作和非虚构文学之间的张力所隐含的知识人与他们所栖身的民间之间的关系。”^①当文学研究界对非虚构写作抱有如此大的期望,如何让这些愿景真实地实现于写作者笔端,这无疑需要通过研究者与写作者间有效的、不断的交流沟通,清醒地看待已有问题,从理论建设与写作实践两方面着手解决。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女作家的‘非虚构’写作研究”(2024SJYB106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魏雪慧,文学博士,常熟理工学院师范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海外华文文学。

① 何平:《非虚构写作和时代思想》,《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8期。

(上接第105页)高校劳动教育协同实施机制包含了学校、社会、家庭劳动教育场域的协同,专兼职劳动教育教师队伍的协同以及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建设等。在学校、社会、家庭劳动教育场域协同方面,要建立相关协同制度,充分挖掘校内外的劳动教育资源,因地制宜建立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加强劳动教育的管理和监督,提升校内外劳动资源的利用程度,完善劳动资源的转换机制。在专兼职教师队伍协同建设方面,优化劳动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完善专职劳动教育教师的培训机制、校本教研机制以及奖励激励机制等,并通过聘请校外劳动模范、相关课程专家担任兼职教师等方式,充实劳动教育教师队伍。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一体化建设方面,搭建开放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资源平台,整合、共享优质课程资源,不断健全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管理机制,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劳动教育教育的联通互动,提高大中小学劳动教育质量和水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弘扬劳模精神的‘大思政课’建设实践创新机制研究”(23VSZ150)、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委托课题“陶行知劳动教育思想融入地方高校劳动教育的实践研究”(TY/2022/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纪明,吉林大学劳动教育中心副主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生态经济、劳动教育理论;杜茹,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劳动教育理论。